



邓伟志

口述历史

邓伟志口述
徐有威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伟志口述历史 / 邓伟志口述; 徐有威撰稿.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10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064-6

I. ① 邓… II. ① 邓… ② 徐… III. ① 邓伟志—生平
事迹 IV. ①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1289 号

责任编辑 王 璇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卞书径

邓伟志口述历史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邓伟志 口述 徐有威 撰稿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50 00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064-6/K.179
定 价 42.00 元

编 撰 说 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目 录

编撰说明 …… 1

一、把话说在前头 …… 1

二、动荡的童年生活 …… 3

三、学习室的几个意外收获 …… 7

四、我珍藏的一本出版而不公开的好书 …… 12

五、文风在采风中改进 …… 14

六、在华东局学习“吃透两头” …… 19

七、住在宋庆龄寓所旁边 …… 25

八、你抓革命我促生产 …… 28

九、芦苇荡里“斗、批、‘走’” …… 39

十、在百余家工厂企业劳动 …… 46

十一、顶替小朱进了自然科学 …… 56

十二、忆杨振宁第一次回国 …… 61

十三、沿着铁索桥走向民族理论 …… 64

十四、无报不转载的短命文章 ……	73
十五、百科十年故事多 ……	79
十六、中国年鉴事业的初创 ……	88
十七、内参逼着我去找“姑姑” ……	92
十八、“窝窝头”进了社会学 ……	101
十九、“耳朵认字”的风波 ……	106
二十、大题小做也惹麻烦 ……	112
二十一、“邓氏三论”的插曲 ……	116
二十二、“妇女学”提出之烦恼 ……	121
二十三、引人乱猜的《马克思主义的“突破”》……	126
二十四、谁搭台？谁唱戏？ ……	131
二十五、享誉毁誉发生在同一天 ……	140
二十六、得了奖而不上台领奖的《邓伟志信箱》……	146
二十七、“人和”引发了不和 ……	151
二十八、提出“德治”后的拔高 ……	154
二十九、《不创新毋宁死》的遭遇战 ……	157
三十、用社会学的显微镜观察社会 ……	160
三十一、在议政中摸爬滚打 ……	170
三十二、在评先进中学先进 ……	177
附录一：邓伟志学术年表 ……	187
附录二：邓伟志编著目录 ……	200
后记 ……	203

一、把话说在前头

老汉我今年七十七，出生于1938年，但不是“三八式”老革命。我真正从事学术还是从大学毕业以后的1960年开始的，迄今有半个多世纪。要把这半个多世纪的事情说清楚，早些年还马马虎虎，现在记忆力每况愈下。就是早些年，由于我厉行“没有忘记就没有记忆”，有意把一些事情变成瞬时记忆，当作过眼烟云，过后不再思量，当时就抛到九霄云外。可是当时认为应该忘记的，未必就应该忘记，今天看也许应该记住，悔之晚矣！

那就来个“亡羊补牢”吧！

在这次口述中，我力求言之有据。如果“据”有不实、不丰之处，欢迎读者诸君指出。

在这次口述中，我力求言之有理。如果“理”有不确、不足之处，欢迎读者诸君指谬。

在这次口述中，我力求言之有情。我说过：我的直接领导（不含间接，间接太多），即顶头上司和同事都有恩于我，有教于我。如果我在口述中有无情之处，欢迎指出来，我立即纠正。

在这次口述中，我力求言之有趣。不管怎么说，活到这把年纪经历的事情不会少。可是在口述时总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有所选择。差不多同样两件事，如果只能取其一，我是力求选择有趣的。目的是让读者看了不乏味，少打几分钟瞌睡。如果读者朋友看了仍觉趣味性不够，也欢迎指点，但是就不请诸位补充具体材料了，因为多数读者不了解我这无名小卒。当然，少数同我有过接触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起那些有趣的故事，仍盼不吝赐教。

再一点，我想跟徐有威教授（本书撰稿人）商量一下，这本口述史是不是紧扣着“匍匐前进”四个字来说来写为好。我欣赏这四个字的理由是：第一，取其接地气的意思。我从小生活在豫皖苏边区，见到过南瓜秧、西瓜秧匍匐在地，枝繁而不遮天，叶茂而不蔽日，葱郁而不争艳，实实在在地贴在地上开花，贴在地上结果。建国前，作为我们冬春两季主食的地瓜，上海人叫“山芋”，匍匐在地，一般不开花，扎根在泥土里。它的根就是香甜的果实。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写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做学问一定要接地气，近水边，不能搞空中楼阁，不能脱离实际。第二，取其脚手并用的意思。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匍匐，手足并行也。”1958年暑期，我参加军事夏令营，受过“匍匐前进”的训练。做学问也必须使出浑身解数，调查、借书、求教该用脚跑的就用脚跑，脚上磨出泡来也得坚持不懈地跑；记笔记、写文章，手累得酸痛也得继续写，要像歌唱家“曲不离口”那样，笔不离手。完整地说，我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的是“十部曲”：“读书——求教——调查——放眼——思考——看透——勤写——传播——呼吁——担当——从零开始”。我手中这笔，有大处落墨时，也有小处着手时，大量的是小处着手。有大江东去，也有小桥流水，大多是小桥流水。大小结合，类似脚手并用也。第三，多少有点消极了，那就是取其前进的速度很慢的意思。我这个人进步慢得如匍匐。人生道路崎岖、坎坷，大错小错都犯过，犯过真错，也犯过假错。何谓假错？那就是有些学术观点，你认为错，他认为不错，先认为错，后来又认为不错。当然，也有当时认为不错，后来认为错了的，再后来又认为不错的。话又说回来，在我身上有没有今天认为不错的，明天会认为错了呢？难说……。如果在学术上碰了钉子，一要重视，二要藐视。如果碰上了大钉子，那也大不了像张可久所写的元曲《卖花声》里的一句话：“读书人一声长叹。”

末了，我对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给我提供如此宝贵的口述机会表示感谢！让我一吐为快。口述出来比带到棺材里去要好。我还要对徐有威教授不畏严寒酷暑，风尘仆仆地录音，然后加工整理，表示谢意！

二、动荡的童年生活

生于“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世界上有不少“无家可归”者。我不是“无家可归”者，可我在幼年和童年时，是“有家难归”者。我出生在国民党放弃徐州，家乡沦陷之后，出生于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家乡成为黄泛区那一年。陇海路、津浦路都穿越我的家乡江苏萧县（萧县旧属江苏，1955年后归安徽）。因此，我的家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在我记事后，我就知道我的家乡为国共两党的“拉锯区”。什么是“拉锯区”？那就是忽而为共产党领导，忽而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时候，甚至是昨天为共产党领导，今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白天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黑夜为共产党领导。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搞重庆谈判，可在我的家乡国民党突然、悍然发动了尚口战役。因为共产党事前没有准备，吃了大亏。我父亲连给家里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便随部队西撤了。

我家所在的薛庄属一区，离县城近，乡、区、县称我们“匪属”，三天两头封门，抄家，训话，派差事，管得紧。我们便向西南逃。当时我们那里名义上属豫皖苏区党委领导，具体地说，属豫皖苏下属的萧宿永专署（代号是三专署还是八专署我说不清楚）领导。萧县当时属江苏，宿县属安徽，永城县属河南省。萧宿永专署跨三个大省，位于三个省的结合部。在我的记忆中，仅仅是这三个县，也就是三个省，我们起码住过十几个村庄。有次还住过山东的单县。所好的是，在豫皖苏一带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正规部队撤走了，地下党还在。地下党会照顾我们。群众能看得出谁是地下

党也不会向国民党举报，而且是仍然听地下党的安排，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得道多助”，就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写照。那时遍地是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贵人相助，都有高人指点。就是大地主，他们也会因为立足在“拉锯区”，不得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也不太欺负共产党的家属。

群众是“母亲”

前些年人们说的“老九不能走”是指“九儒十丐”的“儒”，即知识分子不能走。在我们家乡沦陷后，老百姓所讲的“老九不能走”是指的新四军四师下属的由张爱萍任旅长、韦国清任政委的九旅“不能走”。九旅在，百姓有依靠，能睡个安稳觉；九旅一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抗日时期九旅在我们家乡深受百姓拥戴，抗战胜利后，拥戴过九旅的百姓把他们那份对九旅的“感情”转化为对抗属的关爱。九旅没有了，九旅在百姓中扎下的根还在。除了九旅，还有新四军四师下属的萧县独立旅，在我们家乡播下的革命良种继续在发芽。我大舅纵翰民是独立旅旅长，他和他的部下对我们的教育那就更多了。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们逃难中遇到好人的几个故事。

在一个山坡下有个集镇，南头有个交叉路口，一位老大娘天天在那里摆个花生摊，卖花生。我每次见到她，她总要把我从母亲身边拉开，抱抱我，说是喜欢我，抓把花生给我吃。我母亲也只认为她是好心人，不知道别的。1948年底我们家乡一解放，她就当上了区妇女主任。后来知道她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在她眼皮底下，从她花生摊旁边经过。

还有一次，我们逃到一个大村庄，住在地主大院隔壁，受到地主家雇用的长工田叔叔的关照。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地主竟然支持他关照我们一家。只是到我们离开的时候，田叔叔才说了一句，他见过我父亲，没说是朋友。哪知，没过多少日子，豫皖苏区党委派人牵了匹高头大马把他接走了，说是到哪里当县委书记去了。长工成了大领导，众所周知不识字的人居然早年读过很多书。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后来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很久以后才

晓得那长工田叔叔就是上海解放后嵩山区、邑庙区的田启松区长。再过了好久，我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田启松叔叔，他才跟我讲起他那传奇的过去。

还有一次逃难更加离奇。国民党反动派要对我们下毒手，限期要我母亲把我父亲找回来投降，不找回来就杀掉我们当儿女的。敌人还设了封锁线，要逃也逃不出，只有在家等死。就在走投无路时，曾任国民党的一大代表、江苏省法院院长的刘汉川（字云昭）要娶侄媳，刘汉川的儿媳即大画家李可染的妻妹出了个点子：堂弟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押轿的，按当地习俗就是派个男孩把新娘子接回来。算命先生和巫婆算来算去都说我的生辰八字最合适，慑于刘汉川的名望，没人阻挡我去押轿。到了新娘家的第一晚，突然来了好几位奶妈即保姆，扑通一声全都跪在了我面前，说：“请少爷赏我们几个钱吧！”天哪！我身无分文还不说，连身上的漂亮衣服都是借来的，拿什么赏钱呢？正在我发愣时，一位中年男子把好几块银元撒在了地上。我这才松了口气。又是这中年男子当夜把我转移到我直到今天也说不清楚的一个什么地方，总之是没有回家，逃过了一劫。后来知道，刘汉川是上海地下民革的领导成员。上海解放前夕起义的国民党刘昌义将军，就是刘汉川策动的，早在1948年刘汉川就介绍刘昌义加入了地下民革。

再一次是国民党的大部队来了，一位熟悉的好人带我去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估计国民党的部队不会住那里。哪知我们到了那里，国民党的部队也到了。那位好人已无法同老百姓详细说了，只好背着国民党部队在胸前向一位老大娘做了个手势，大拇指和食指朝下拉开，那位大娘看了他的手势，知道那是“八路军”的“八”字，便连忙喊了声“儿子过来”，一把把我拉了过去。我按老规矩，立即称他“娘”。就这样，我就在这个“娘”家里吃住了好几天。像这样的“一日之娘”、一周之娘，我在苏鲁豫皖一带大约有几十位。

就是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从感性认识上帮助我确立了一个朴素的人生观，并进而帮我确立了后来的写作观。这些年，我宁可不过某些人的喜

欢也要为弱势群体呐喊。我认为,如果不承认有弱势群体存在,就很难有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迫切性和积极性。我一再地呼吁恢复农会。我之所以被人称为“贫困社会学家”,应当说跟我童年时代受过贫苦农民保护的这段经历有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唱着“挖掉穷根”的歌儿度过童年的。

寻找“母亲”

2004年春,新华社上海分社组织了一个赴江苏的科学发展观报告团。我年岁大,新华社首先叫我在江苏各个城市中挑选。我选择了宿迁市。不仅新华社对我选宿迁觉得奇怪,而且连宿迁市的领导也觉得意想不到。他们提出后,我便在报告中加进了一段我选择宿迁的动机:是来寻找“母亲”的,是来寻找恩人的。

大概是我出生不久,在我大舅任过中共宿迁中心县委书记的地方,有次急行军,我成了累赘。为顾全大局,父亲母亲含泪把我扔在了宿迁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月后,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母亲自然会想到、并与别人谈起她扔掉的这个儿子是否还活着。喜出望外,话没落音,一个老大娘把我交到了母亲手中。中国人一贯主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宿迁“母亲”于我的恩情远不是滴水,而是乳汁,是她把应当给自己儿子吃的乳汁,让我来吮吸。这份大恩厚恩我怎能不报呢?我决心到宿迁找到这位好心的母亲。我在几百人的大会上讲了以后,我几乎天天盼着有“母亲”的消息传来。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没等来喜讯。

宿迁的农民、苏鲁豫皖的农民是中国农民的一部分。我没能报答宿迁农民、苏鲁豫皖农民的养育之恩,也更加激励我要把报效工农、报效中华民族的赤诚之心,化为我今天学术研究的目的地和动力。一直生活在实践中的群众,既是理论的源泉,也是鉴定理论成果的高评委。在这一点上,我矢志不移,坚持不懈,直到2014年5月25日,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层是智力库,群众是思想谷》的文章。

三、学习室的几个意外收获

毕业论文意想不到地发表在《学术月刊》上

我是1960年从上海社科院经济系本科毕业的。一提“1960”大家就会知道，在那年代我们是“一切听从祖国召唤”。1960年3月下旬，我在毕业志愿表上写了首打油诗，表达了自己“哪里需要那里去”的心愿。不料，3月30日上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年级党小组长把我从教室里叫出去，指引我登上了学校的解放牌的大客车。车上大约有三十多人，有老师，有同学。去哪里？我不问，看得出是好事就是了。不一会，车子开进了延安西路33号市委大院后门，走进了市委宣传部的会议室。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社科院院长杨永直进来，宣布社科院成立两个室，一个是学术情报室，再一个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室。随后就宣布了名单，学习室好像是十九人。我被分配在毛主席著作学习室。

毛主席著作学习室的主任由社科院副院长庞季云兼任。他是1958年从中宣部下放到中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他本是胡乔木的秘书、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任处长）。大家对他都很敬重。

有一天，庞季云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毕业论文写的什么。我说：是写的人民内部矛盾。庞季云要我送他看看。我就誊写了一份送他。6月初，我们到南汇航头参加夏收夏种。休息时，忽然有人把1960年6月10日的《解放日报》塞到我手里，说：“大作发表，旗开得胜。”我看了《解放日报》上的《学术月刊》第6期目录，简直是无地自容，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从航头回到室里，《学术月刊》还没有发行，几个人说起这件事。庞院长说是他推荐的，因为6月正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

三周年，需要这样的文章。他又说：“我在你的文章上加了一句，还不知道编辑会不会把这句话删掉？”我深为庞院长提携后人的精神所感动。没有他的推荐，我那文章是不可能发表的。再就是，他能在我文章上加进文字，是我莫大的荣幸。他却留有余地，谦虚地说：“编辑会不会把我加的那句话删掉？”他这句话对我一辈子起作用。几十年来，每当我对我的学生讲文章时，都会忆起庞院长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我不敢把我对学生的批评绝对化。

事过境迁，今天看来我那文章充满了“左”的字眼，当时看是旗开得胜，后来看是马失前蹄。这就是我治学的起点。

毛选四卷怎么少了一篇？

学习室的主要任务是迎接毛选四卷出版。可是，毛选四卷有哪些篇章，谁也不知道具体的，连有条件通天的庞院长也毫无所知，只晓得一个时间段：解放战争时期。于是，庞院长就叫冉兆晴、强远淦带领我自编《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好在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是红大、抗大教员，多次听过毛主席讲课。尽管解放战争时期他到了山东，但也知道很多中央的情况。院长杨永直是《解放日报》和晋察冀《人民日报》编辑，也知道哪些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庞院长也在中央研究室工作过，毛泽东、朱德都对他有书面批示。他们都会不断地提示、提醒我们。为了编得好一些，还从市委党校（当时好像称“中级党校”）请了两位党史教师坐镇指点。庞院长安排我翻阅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晋察冀的《人民日报》，指示我把署名“毛泽东”的要收入，没署名“毛泽东”的、认为有价值的也要收入，并且写出文章背景。到了6月（也有可能是5月），聂荣臻元帅来上海同柯庆施讨论研制导弹问题，并且带来了一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目录。拿来一对比，方知我们漏编好多。接下去，我们就按聂荣臻的目录继续搜集。9月中下旬，学习室先拿到一本绝密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样书。十几个人轮流看，上海有家的同事白天看，我们住集体宿舍的单身

汉夜里看。10月1日起，全国开始发行。庞季云分配我一项任务：对照原文改在新书上，看看有哪些修改。因为在对照时会出错，改得较乱，我便把勾勾划划比较乱的一本留给自己，誊清无错的呈送庞季云。我这一本一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有时翻翻，对于为什么这样修改都会悟出点新想法。

在对照中，我发现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比聂荣臻的目录少了一篇《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为什么单单抽掉了这一篇？这个问题，我默默地藏在心底，莫非不是毛泽东写的？直到1964年我跟随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搞“四清”，不知怎么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这还不容易理解吗？李宗仁在同我们拉关系呗！”我恍然大悟。几个月后，李宗仁到了北京。想不到这天大的秘密让我提前晓得了。

张锡媛是谁？

学习室成立时设在瑞金花园，就是现在的瑞金宾馆靠复兴路那一边。瑞金宾馆是过去日本的三井花园，樱花特别多。日本投降后是国民党的励志社。解放后一分为二，中间用竹篱笆隔着。靠永嘉路的那一边，是招待所，听说苏加诺、陈云、江青都在那边住过。靠复兴路这一边，有三幢小洋房，曾是陈毅、饶漱石、谭震林三家在解放初的住处。上海刚解放时，邓小平也在这里住过很短时间，后来他就从这里下西南了。我们学习室住在陈毅住过的、接近瑞金路的那座小洋房里。

在三幢洋房中间，有两处简易平房，一为食堂，二为乒乓球室。在乒乓球室里，有两口很小的棺材：一口写的是苏兆征，还有一口写的是张锡媛。苏兆征人人皆知。张锡媛是谁？没人知道，上海的党史专家不知道，从南京政治学院来学习室交流的专家也不知道。有一天，在议论张锡媛时，我调皮地说：“张锡媛是苏兆征的妻子。”庞院长听了，马上批评道：“不知道不要瞎说。”我暗自思忖：庞院长批评我瞎说，说不定他是知道的。有一天，庞院长叫我到旧书店仓库里买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大管家波格丹诺夫的书。我花很大工夫买到了，不仅买到了波格丹诺夫的书，而且还买到了一本未

署作者姓名的《辩证唯物论》一书。庞院长看了很高兴，同我拉起家常来。

我乘兴问了一句：“张锡媛是谁？”他顿了顿，说：“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两年后，我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工作。不久，跟随华东局机要局副局长葛非一道下乡。他曾在陈毅、饶漱石身边做机要工作，也在瑞金花园住过。闲聊后知道，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见过张锡媛的棺材。“文革”开始不久，马路上刷出大标语：“强烈要求打开苏兆征棺材，有人在棺材里私藏武器”。我连忙把这条大标语告诉已“靠边”的葛非。他说：“你赶快去看看，还有张锡媛的……”我到了瑞金花园，老传达告诉我：“已平安转移了，你放心！”我回来就向葛非汇报。

“文革”后，葛非成了市委接待办的负责人。我们都住在吴兴路一幢楼里，他家住三楼，我家住二楼。他做什么工作，我不问，但能猜出三分。他什么时候不回家，我们就知道有要人来了；他能回家了，我们就知道要人走了。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问我张锡媛的棺材的事。我说：“只知道安全转移了。不问转到哪里去？”他放下电话，立即通过市委办公厅正式渠道，当天下午就知道早已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了。

葛非知道了下落后，并没有马上告诉我。我仍继续向“文革”后负责清查市民政局并留在民政局当局长的丛局长打听。丛局长说：“‘文革’初，有人闹的时候，民政局明明知道邓小平被打倒了，但是张锡媛是烈士，他们出于正义感，出于对邓小平的尊敬，就悄悄地把张锡媛的棺材拉到龙华了。”

过了一段时间，葛非才跟我讲了寻找张锡媛的来龙去脉。

有一天，葛非陪邓小平散步，邓小平忽然问他：“我解放后在上海，花很大功夫找到了张锡媛的棺材，现在也不知在哪里了？”几个小时后，葛非告诉邓小平：上海市委帮他找到了，安葬在龙华。邓小平便马上吩咐邓榕和秘书第二天各持一支玫瑰花，去了龙华，献给张锡媛。葛非还特别强调了一下，有人讲是一束花，不是的。邓是按国外的习俗，每人一支。邓榕从龙

华回来后，向邓小平说：“很漂亮！”邓小平开心地说：“人比照片上还要漂亮……”逗得大家都笑了。找到张锡媛墓以后，邓小平一直很兴奋，直到离开上海时，还念念不忘上海帮他找到张锡媛的事。

我知道上述过程后，也专门找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中央机关的大秘书张纪安，他是张锡媛的上级。为了掩护身份，他与邓小平在上海现在的浙江路合伙开过一个杂货店。我请他谈谈他对张锡媛的印象，以及患病和安葬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在学习室时的又一“意外”收获。